

# 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路径差异 ——以帕森斯与阿格尔为例

陈艺文

**摘 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包含多重内容维度和研究进路的理论或话语体系, 不仅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应用, 也离不开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绿色转型实践的批判性分析与超越性构想。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初期就呈现出两种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一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经典阐释”路径, 帕森斯坚持从经典文本出发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并从辩证的生态自然观、资本主义寄生性生态批判、社会主义生态及其转变战略三重维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本框架。二是以阿格尔为代表的“理论重构”路径, 阿格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来拓展其生态向度, 并从异化消费分析、生态危机阐释、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构想三个方面建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两种差异化的研究进路直接影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理论样态与发展格局, 其理应成为推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相互补充的维度, 这对于构建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生态马克思主义; 帕森斯; 阿格尔; 经典阐释; 理论重构

**中图分类号:** A811.6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0)05-0025-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0.05.003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理论家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维度的阐释与建构, 以此分析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成因及其解决路径, 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和理论方法的差异,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初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研究进路,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桥港大学霍华德·帕森斯 (Howard L. Parsons) 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本·阿格尔 (Ben Agger)。前者在 1977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中首次以专题摘录的方式整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议题的代表性论述, 并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理论诠释, 展现了以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解读为基础的“经典阐释”路径; 后者在 1979 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不仅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 并通过对人类需要、消费与生态的矛盾关系的分析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发展了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时代创新为重点的“理论重构”路径。正是上述研究路径的差异决定了其理论构架上的多重维度与内在困境, 并对后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拓展与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从思想比较的角度对其方法特征及其局限进行分析。

##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一般而言, 虽然马克思在 19 世纪中期就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繁荣景象中看到了“日益迫近的

作者简介: 陈艺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cheneywen@pku.edu.cn (北京 100871)

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sup>[1](P610)</sup>，但生态环境问题并未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随着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生态关切纳入到他们的理论分析中，并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主题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动态的角度来说，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便开始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深入研究自然界及其与社会关系。苏联学者率先采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地球生物圈及其内部联系，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成为了生态研究的中心<sup>[2](P271)</sup>。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多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特征。卢卡奇在1922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社会历史维度，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sup>[3](P210)</sup>，并借助对物化现象的分析，推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开创者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本性，通过对西方现代性根源的批判揭示了人征服自然的历史文化逻辑，强调了资本主义支配自然的力量和支配人的权力之间的现实关联<sup>[4](P31)</sup>。施密特在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出于恢复马克思社会历史辩证法的目的，再次阐述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社会历史性质，并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理想中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sup>[5](P59-177)</sup>。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自然观的阐释、对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理性和文化价值观的批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sup>[6]</sup>。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自然异化及其解放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延伸拓展，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现实社会危机与变革困境的理论反思与回应。一方面，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形成了关于环境灾难的社会抗议和理论探讨的热潮，而国际资本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陷入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资源争夺的困境之中，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越南战争的深入进一步加剧了世界不稳定格局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群众性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失败反映了激进政治变革实践的深层困境，也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深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变革的现实可能与新型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马尔库塞开始注意到生态运动所蕴含的社会变革潜能，将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是对自然——人的自然和外部自然的战争”<sup>[7](P174)</sup>，“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sup>[8](P127)</sup>，而“真正的生态学要转入一场争取社会主义政治的斗争”<sup>[7](P176)</sup>。

特别地，师承马尔库塞的威廉·莱斯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1972）和《满足的限度》（1976）中，一方面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近代以来生成的控制自然观念，并揭示了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的内源性要求，强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控制应同时意味着“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sup>[9](P168)</sup>；另一方面关注到了现代资本主义高强度市场架构和高消费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异化与生态破坏，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需要和商品之间相互关系的批判性审视与重构，逐渐建立一个克服过度消费、回归人类真实需要且平衡生态圈其他生命需要的“易于生存的社会”<sup>[10](P129)</sup>。正因为莱斯深刻地揭示了征服自然观念背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根源，并论述了商品消费、需要与生态的辩证关系，提出构建分散化的政治组织与稳态经济形式的替代性构想，莱斯被阿格尔称为“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sup>[11](P475)</sup>。

可以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兼具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和明确生态议题关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这不仅表现为马尔库塞和莱斯等人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的劳动本质等思想的重新阐释与运用，也表现在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视域向消费文化与政治生态学批判的拓展，而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也包含着对生态主义思潮的批判与吸纳。正是在此基础上，帕森斯和阿格尔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再阐释和危机理论重构出发进一步推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

## 二、帕森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阐释

帕森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的创始人，长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话与传播，并积极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由于20世纪以来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严重生态环境问题，而主流思想界仍然持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误解和偏见，帕森斯开始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立场，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生态学’”<sup>[12](P. xi)</sup>。

### （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诘难”的批判性回应

帕森斯在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一书中，分十个章节从人与自然依存关系、人对自然的技术化应用、前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共产主义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等主题编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生态议题的篇章论述，其中包含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大部分经典著作。不仅如此，帕森斯还通过批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诘难”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

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坚持人与自然对立？帕森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论述人的自由本质的过程中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动性，是在论述人类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意义上强调人对创造历史的主宰。但“人是由自然元素构成的，是在与自然环境的辩证关系中发展起来的”<sup>[12](P36)</sup>，人类的自由是在他的身体及其与自然关系的约束和可能性之内实现的，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

其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忽视外部自然的价值？帕森斯认为价值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客观关系，价值的创造离不开自然的参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经济需要，也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审美需要，将自然视为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sup>[13](P190)</sup>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脱离人与自然关系抽象谈论自然的价值，“只要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不能把自然整体本身视为不依赖于人的关注对象”<sup>[12](P44)</sup>。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经验和需要来对待自然，对自然生态的关切就是要维持与改善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其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社会矛盾斗争是否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帕森斯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正是要说明阶级对立是需要而且能够被历史消除的。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着合作或劳动共同体，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合作才建立在赤裸裸的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基础上，因而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才能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可见，“人们应该谴责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然和人类”<sup>[12](P42)</sup>。

其四，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是反人道主义和反道德的？帕森斯认为，人道主义就是将一切真理与价值都置于“人与其客体相互作用的经验性考察中决定”<sup>[14](P37)</sup>，它不仅是一种理论和态度，更是一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目标和精神上本来就是深刻的人道主义”<sup>[12](P58)</sup>。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探索如何让人类在理论与实践发挥其创造性力量，他们抗议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者和自然的奴役和压迫，要求恢复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伟大历史行动，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才能将大多数劳动者从社会和自然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人的道德”<sup>[15](P100)</sup>。“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sup>[12](P67)</sup>

## （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初步构建

帕森斯不仅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还从生态自然观、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及其转变三个方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首先，帕森斯阐述了辩证的生态自然观。其一，人类依赖自然而生活。帕森斯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强调“人深刻地依赖于一种先在的自然”<sup>[12](P69)</sup>。“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类通过外界自然的滋养而实现自身呼吸和饮食等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sup>[12](P22)</sup>人类适应自然并从事生产活动，而“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意志和实践都深深植根于自然的进程中，并与之有机结合”<sup>[12](P10)</sup>。其二，人类在劳动中发生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为整体的自然本身就是辩证的，“自然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对立统一，它们相互创造，相互破坏，相互转化”<sup>[12](P129)</sup>。而现实自然界的辩证运动是通过人类劳动这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形式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被转化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要素，实现了社会历史性的人与自然统一。其三，人类通过改造自然来创造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显著特点不在于他们的物质统一性观点和辩证法，而是他们对人类历史和社会中辩证力量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事业，是一个本质上人化了的自然。”<sup>[12](P9)</sup>通过对社会历史运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自然与人类及其社会的历史阶段性关系，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

其次，帕森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寄生性生态关系。帕森斯指出：“寄生物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存在，它占用了其它存在物的生存能量。”<sup>[12](P32)</sup>按照这一生态学定义，“资本是一种真正的寄生物”<sup>[12](P32)</sup>。因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sup>[15](P550)</sup>，而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却对劳动者和自然进行占有、控制和征服，它不仅攫取了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支配着自然使其服从于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16](P269)</sup>资本主义在利润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必须据其逻辑选择利润，因为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始终坚持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方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从根本上否定了保护人类生命和满足人类需求、全面的社会规划以及长远考虑生产决策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的首要性”<sup>[12](P76)</sup>。因此，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果，“是参与复杂合作的生产力（机器、技术和工人），与剥夺工人并控制其产品所有和分配的制度之间矛盾深化的结果”<sup>[12](P25)</sup>。

再次，帕森斯论述了社会主义生态及其转变战略。他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为一个人性化的、有计划的、坚持社会与生态导向的社会主义制度，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移交给整个社会。社会主义不仅将人从社会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也将有计划地使用和培育性地重建自然，保持和优化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在其中，人对自然的利用将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心而不是贪婪，慷慨而不是占有，和对自然和社会的计划而实现的控制”<sup>[12](P70)</sup>。因此，“社会主义（将）使人恢复一种合乎其自然本性的社会形式和一种合乎其社会性质的自然”<sup>[12](P94)</sup>。而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程中，“生态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相联系”<sup>[12](P105)</sup>。全球的左翼政治运动必须参与生态斗争，并真诚地和所有团体一起致力于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重建地球家园“必须由跨越国界合作的人民来实现”<sup>[12](P103)</sup>，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地区之间的互助合作。帕森斯强调：“今天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存在的地方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和在社会主义不存在的地方去创建它们，也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对非人类自然的破坏和剥削。”<sup>[12](P104-105)</sup>

## 三、阿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建构

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概括并论

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正如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视为一种革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sup>[8](P49)</sup>，阿格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sup>[11](P5)</sup>，并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非决定论和经验性的特征。前者表现为将革命进程与历史发展理解为人意识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即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联系与作用；后者体现为将人的存在首先理解为现实性的经验存在，并从现实的经济政治关系来透析社会的内在矛盾。由此，阿格尔将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为异化及解放理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 and 危机理论，分别讨论的是哲学层面的历史主体因素、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历史结构因素、现实经验层面历史革命与解放的条件与可能性，它们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并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模式的发展。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只注意到辩证法的内在矛盾理论而陷入了决定论，卢卡奇等人重新发展了异化批判理论，但法兰克福学派忽视了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分析，最终走向了诉诸个体解放斗争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这要求将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其新型统治形式的分析结合起来，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走向生态马克思主义。

### （一）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阐释

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的构建内在地包含对马克思异化理论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的发展。就前者而言，在阿格尔看来，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发展出异化消费的统治形式，即“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sup>[11](P494)</sup>。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无法收获自由与幸福，只能通过商品的疯狂占有和消费来寻求自身的满足；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利润的增长必须不断激发消费需要以便刺激商品生产，因而发展了连锁性的广告和媒介操纵将人们的需要引向商品消费中，并借此消解人们的批判意识以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是，异化消费的发展不仅在社会层面造成了对社会个体的深度控制与异化，也在生态层面导致了不加限制的商品生产所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就后者而言，阿格尔认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需要放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辩证关系中加入全面地审视，现代挥霍性的工业生产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积累扩张动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sup>[11](P420)</sup>。因此，“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sup>[11](P420)</sup>。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将谋求资本增殖视为首要目的，这必然导致不断扩大的商品生产和对自然的索取，使得地球资源有限性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自然与资本的冲突。

由此，异化消费的统治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本性所带来的对工业增长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生态危机。阿格尔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sup>[11](P486)</sup>而由人的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与生态系统的限制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将为社会主义的变革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的条件。

### （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变革构想

基于上述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分析，阿格尔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变革构想，其核心在于通过资本主义无限生产与消费幻象的破灭及其所促动的人们价值观与幸福观的转变来实现社会变革。这具体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第一，生态系统无法支持经济无限增长，要求缩减制造商品的工业生产；第二，物质丰裕的缩减会引发对需要方式的重新评价和思考，促使人们改变消费主义的幸福观；第三，对需要方式的反思将使人们意识到生产活动对自我实现的意义，将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转变为创造性劳动与生产性闲暇的协调统一。不仅如此，“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并

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现象，它还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充分批判，才能转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在阿格尔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大规模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官僚化的集中管理方式，都是资本追求利润和统治自然的重要方式。对此，阿格尔提出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创造一种“节约能源的社会主义”<sup>[11](P509)</sup>。一方面，实行自动化与小规模相结合的混合技术方案来发展非集中的工业生产，并采取稳态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另一方面，推行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来替代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让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自主规划生产过程，从而克服“劳动—闲暇”的二元论，摆脱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最终实现自然与人的双重解放。

最后，社会主义变革还需要一种新的激进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把对集中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失望转变为对资本主义权力和阶级结构的批判。针对北美的思想文化土壤，阿格尔认为有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融合，“民粹主义（破灭了的消费者期望）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可以通过正确评价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而结合在一起”<sup>[11](P519)</sup>。美国民粹主义在 19 世纪 70 年代具有广泛影响力，其主要特点是主张基层民主与政治分散，反对集权主义的庞大经济政治模式，因而它十分有助于推进生态激进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和阶级制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助于补充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变革要求，并将其对集权的政治统治与企业模式的批判引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方向。可见，阿格尔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将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开辟社会主义新前景。但如何将激进的热情化为现实的革命，阿格尔表达出一种悲观的看法。在他看来，广大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察觉到异化消费对他们和自然的危害，看不到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解放愿景，现实中也缺乏克服异化劳动的解放动力。同时，既存的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团体还没有意识到非极权和分散化的所有制对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因此，阿格尔承认：“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集中关注到生态激进主义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sup>[11](P507)</sup>。

#### 四、理论样态及其构建路径的差异

可见，帕森斯和阿格尔的理论探索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与创新性价值。具体而言，帕森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中的生态思想所做的较为系统的整理与阐发。他不仅首次集中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评，并以大量篇幅编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论述的篇章段落，而且从辩证的生态自然观、资本主义寄生性生态批判、社会主义生态及其转变战略三个方面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本框架。阿格尔则首次宣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通过阐述异化消费等新型统治形式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整个地球生态的内在矛盾，并构想了具体的北美社会主义革命战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即重视消费而非生产、强调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提倡分散化与民主化的稳态社会主义。尤为重要的是，帕森斯和阿格尔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分别呈现出的“经典阐释”与“理论重构”研究路径，实际上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条重要进路。

就前者而言，其重点在于以文本解读带动思想建构，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生态观点的归纳阐释，发展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架构和批判方法。帕森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内含不同议题的零碎材料的混杂品，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仔细和开放性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总是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sup>[12](P. xiv)</sup>。只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生态的思考集合起来，就能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且有力的哲学框架和方法，为我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与原典式解读，帕森斯不仅重点阐

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也凸显了其社会历史的批判视角，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置于现实的社会矛盾中予以考察，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对生态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强调已经以研究人类社会问题及其经济政治方案的形式得到了发展”<sup>[12](P11)</sup>。但不得不承认，帕森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辩护立场多少限制了其理论创新与方法拓展的空间，没有发展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真正对接起来的中介性理论环节，而这往往需要更加明晰的方法原则和更为创新性的概念框架。

后者则主要是基于时代问题的理论重释，即结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做出时代化的创新拓展，其中包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论点的补充与重构。阿格尔直言：“我们的目的不是周密地考证马克思确立一种永远有效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确立一种允许我们根据历史和文化的相应条件重建这种理论的辩证法。”<sup>[11](P17)</sup>他把马克思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辩证法，认为其中的危机及解放战略理论属于经验性的层次，而马克思基于早期资本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危机与革命理论是需要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加以改造和发展的，这在当代就是要根据由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和过度生产引发的生态危机去重构马克思的社会危机与革命战略理论。由于阿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解与历史性把握，他一方面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去透视 20 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另一方面深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及其变化趋势，敏锐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重构的理论基因与现实契机，进而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向度——将其提升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方式、意识观念和生态关系的综合性审视，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与解放潜能。但是阿格尔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分解式理解与应用忽视了其理论逻辑的整体性，对唯物辩证法的机械化阐释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修正直接导致了其理论构建中的马克思主义内核的弱化。

进一步而言，上述两种构建进路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关系上呈现出不同的理解与把握方式。帕森斯强调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的批判性态度，并构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贯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帕森斯认为，生态主义由于其非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倾向，无法破除现实中支配人与自然的剥削性社会结构，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并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正是由于帕森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立场与资本主义批判视角，澳大利亚学者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将帕森斯视为“正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其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距离<sup>[21](P250-276)</sup>。实际上，帕森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也充分展现了其试图将生态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尤其是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自然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素的强调<sup>[17]</sup>，认为“所有的价值，无论是所谓的经济价值，比如空气中的氧气或食物，还是所谓的更高价值，比如音乐，都在非人类自然中有其最终来源”<sup>[12](P23)</sup>。而为了从整体上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帕森斯分析了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生态学是辩证法在生命系统中的应用，辩证法是生态学方法从生命系统到所有系统的归纳”<sup>[12](P7)</sup>，“生态学是充分一般化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生态学在人类事务中的具体应用”<sup>[12](P29)</sup>。这意味着，生态学方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素。基于此，帕森斯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的核心要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实践与外部自然之间辩证作用的把握，蕴含了一种深层实践要求——共同控制并自觉保护有利于人类福祉的社会与自然条件。因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一种旨在超越原始公社生态学和阶级生态学的“社会主义高级生态学”<sup>[12](P94)</sup>。

相比之下，阿格尔更开放地吸纳生态主义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社会实践的变化。阿格尔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变革的方法论，既需要理论又需要实践。”<sup>[11](P16)</sup>从马克思辩证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根据社会历史的



经验表现来认识和分析人类异化形式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提供社会主义变革战略的马克思主义自我反思与发展过程。为了准确地把握 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异化消费、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资源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具有实践指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阿格尔一方面受马尔库塞等人的影响重新阐释了马克思青年作品中的“感性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思想,强调自然界对人类而言同时具有物质性和审美性或精神性价值,而共产主义对劳动的解放将促进自然及其与人的本质相适应的感觉的解放<sup>[11](P25-26)</sup>;另一方面借鉴海尔布伦纳和舒马赫等人的激进生态主义或生存主义观点来思考将生态危机引向社会主义变革的形式,不仅明确接受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sup>[11](P421)</sup>而必须缩减商品生产与消费的“生态命令”,并主张非异化的社会应当是经济无增长的社会,其相应的社会政治变革要求是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而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将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的缩减与国家调节能力的扩大,以及一种新的禁欲主义和节约精神<sup>[11](P474)</sup>。可见,无论是阿格尔对自然生态限制的无条件接纳,还是他关于激进生态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论主张,都充分反映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拓展或修正方面。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其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大致是延续上述“经典阐述”与“理论重构”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方面,英国学者莱纳·格伦德曼对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观念的辩护<sup>[18](P91-93)</sup>、日本学者岩佐茂对马克思发展生产力思想与环境保护观点的一致性的论证<sup>[19](P117-131)</sup>、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保罗·柏克特分别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意蕴的阐述<sup>[2](P2-74)</sup><sup>[20](P25-257)</sup>,都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观点的系统化归纳诠释,展开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诊断分析,并呈现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阐释向生态理论系统化建构的不断深化过程。其中,格伦德曼和岩佐茂充分肯定了帕森斯在阐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上的贡献,尤其是帕森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控制自然”观念的解读——内在包含着对客观必然性的洞察(Einsicht)和与资本主义自然观的对立<sup>[12](P68-71)</sup>。在此基础上,格伦德曼和岩佐茂认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控制自然”的前提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与遵从,并分别指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共产主义对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共同的、有意识的控制<sup>[18](P92-93)</sup>,遵循生活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sup>[19](P204-207)</sup>。

另一方面,英国学者特德·本顿对马克思主义的绿化<sup>[21](P147-174)</sup>、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拓展<sup>[22](P48-80)</sup>和乔尔·科威尔对革命性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的构建<sup>[23](P200-225)</sup>,则更为自觉地面向现代生态环境问题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框架,并呈现出与生态主义和绿色左翼思潮的紧密互动,认为经过适当修正或生态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与超越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奥康纳既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sup>[22](P6)</sup>,又强调需要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而文化维度,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更为有效的分析与批判。同时,奥康纳批判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过于关注消费行为的反生态效应而忽视了对生产系统的深刻分析<sup>[22](P279)</sup>,并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及其革命战略的分析,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面临着资本的生产过剩与资本的生产不足双重危机,相应的社会变革需要实现传统劳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相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同盟,从而清晰地说明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性和反生态本性及其超越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着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与研究进路差异<sup>[24]</sup>,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推动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的理论样态与研究进路的思想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进行深度耕犁与阐释,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维度上的创新性拓展与应用。总体而



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遵循了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批判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方法，并彰显了对资本逻辑的执着批判和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解的不断探求，拓展了从生态角度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空间。但应当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还是一个包含一系列基本概念和核心观点的科学理论。面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发展形势、人类生存境遇和解放条件的变化，我们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论逻辑和核心观点的深刻理解与总体把握。

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包含多重内容维度和研究进路的理论或话语体系，它不仅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应用，也离不开对当代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绿色转型实践的批判性分析与超越性构想。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研究与建构不仅需要更为准确、系统地梳理与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必须主动与社会历史现实，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并在与世界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互鉴中确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

### 参考文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肖峰,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3] [匈]卢卡奇·格奥尔格.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德]霍克海默,[德]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5] [联邦德国]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吴仲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6] 王雨辰.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及其当代价值[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 [7] Marcuse, H.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Thre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8]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美]阿纳托尔·拉波波特,[南]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等.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任立,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9] [加]威廉·莱斯. 自然的控制[M]. 岳长龄,李建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10] [加]威廉·莱斯. 满足的限度[M]. 李永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1]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慎之,梁树发,黄继锋,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2] Parsons, H. L.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7.
- [1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Parsons, H. L. *Humanism and Marx's Thought* [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s, 1971.
-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吴宁,宁甜甜,孙鲁. 帕森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三个维度[J]. 鄱阳湖学刊, 2020(2).
- [18] Grundmann, R. *Marxism and Ecolog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19] [日]岩佐茂. 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 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 [20] Burkett, P.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21][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M].曹荣湘,李继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23][美]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M].杨燕飞,冯春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4]O'Connor,J. Marx's ecology or ecological Marxism?[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01(3).

## Path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t Theory

### — Taking Parsons and Agger as Examples

CHEN Yi-wen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as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multiple content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approach,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Marxist theoretical methods, but also inseparable from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transcendental concep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m, two distinctive research paths were presented. One is the path of "classic interpretation" represented by Parsons. Parsons insists on explaining the ecological 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from the classic text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theories frame of Marxist ec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ecological nature, capitalist parasitic ecology criticism, socialist ecolog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The other is the path of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represented by Agger. Agger expands Marxism's ecological dimensio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its crisis theory, and constructs ecological Marxism from the analysis of alienated consump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 Two differentiated research approaches directly affect the diversified theorie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they should become two complementary dimens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Parsons; Agger; classic interpretation;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